

伊凡雷帝的专制思想及其文化表现

任光宣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提 要: 在俄罗斯, 从伊凡雷帝开始了沙皇专制制度。专政制度既是一种社会体制, 又是一种文化现象。伊凡雷帝不但是专制思想的奠基人和理论家, 而且还是它的实践者。本文对伊凡雷帝的专制思想产生的宗教哲学背景、主要内容及其文化表现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和探讨。

关键词: 伊凡雷帝; 专制思想; 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 I299

文献标识码: A

—

15 世纪末—16 世纪初, 俄罗斯摆脱了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之后, 形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莫斯科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后, 需要一种与之适应的社会体制, 当时, 东正教拜占庭国家的专制制度经验对莫斯科诸大公颇有诱惑力, 成为莫斯科中央集权国家的首要选择。从伊凡雷帝时代起, 俄罗斯彻底确立了沙皇专制制度国家体制。此后, 沙皇专制制度不断得到强化, 到彼得大帝时代达到了其发展的全新阶段: 彼得大帝废除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牧首制, 吞并了牧首的权力, 彼得大帝本人变成了“尘世的上帝”, 拥有绝对的独裁权力。这样一来, 彼得大帝大大地强化了世俗沙皇的专制权力, 把专制制度推向极致。

俄罗斯的专制制度既是一种社会体制, 又是一种俄罗斯文化现象, 它产生以后一直贯穿在长达 400 多年的俄罗斯历史过程中, 反映和表现在俄罗斯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

众所周知, 在莫斯科中央集权国家尚未形成之前, 古罗斯曾经是公国林立的封建割据国家, 各公国的大公虽各自为政, 但那时候大公并不是大权独揽, 其权力以及制裁权不是绝对的, 就是说大公们并不具有专制的权力。10—14 世纪, 市民大会 (“вече”, 亦译“维切”) 是古罗斯大贵族限制大公的权力、城市民众发表意见的机构。这种市民大会不但决定大公对外宣战等重大问题, 而且有推举和罢免大公、批准法律以及与其他国家缔结各种约定等权利。“在古罗斯的许多地方, 市民大会会议不但解决一些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重要问题, 而且确实保障广泛阶层的居民参与管理国家。不过, 市民大会在罗斯不同地方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此外, 市民大会机制依据的不是法律, 而是村社的习俗和传统。” (В.Драч 1999: 294) 在古罗斯, 市民大会把大公推举出来后, 要与他签订一份协议, 以限制大公的权力。就是说, 大公的活动要受到市民大会的限制、同时大公的一些决策要与有着深厚社会基础的大贵族商量, 往往还要听听大公侍卫的意见。大公若是一意孤行, 武断专横, 那么他就会被罢免的。因此, 古罗斯的诸大公没有专制的权力。比如, 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1053—1125) 就是在 1113 年经过市民大会的同意而登上大公宝座的。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深受人民的喜爱, 认为他“爱兄弟, 爱穷人, 是一位为俄罗斯的受难者。”莫诺马赫在位期间, 罗斯大

地上诸大公之间的内讧暂时停息了。因此他被人民誉为“红太阳”。但是，14世纪末蒙古鞑靼人的入侵宣告了俄罗斯市民大会机制的结束。需要指出的是，古罗斯大公没有专制独裁的权力，但并不意味着那时候的大公没有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的想法。早在12世纪后半叶基辅罗斯的莫诺马赫大公和弗拉基米尔公国的安德烈·鲍戈留勃斯基大公就有过独揽大权的专制思想倾向。况且，专制思想作为一种严格的权力很早就存在于古罗斯人的意识之中，专制思想在古罗斯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存在土壤。

俄罗斯文化史学家В.德拉奇认为，“专制制度”（самодержавие）这一概念在古罗斯起初与源自拜占庭的帝王思想，与君主专制的无限权力并没有什么联系，而仅仅与摆脱外来统治的理想有关。俄罗斯历史学家В.克留切夫斯基也指出，在当时的政治语汇里，“沙皇”（царь）和“专制者”（самодержец）与后来它们所获得的涵义不同。“沙皇”和“专制者”并不是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而是独立于某个外部政权之外、不再给任何人进贡的君主。比如，伊凡三世之所以在称自己是“全俄君主”之外，又给自己加上“沙皇”（当时，在罗斯人用“沙皇”来称呼拜占庭皇帝和鞑靼可汗）的尊号，只是表明他不再给蒙古鞑靼可汗进贡，成为一位摆脱了外族统治的东正教君主。后来，蒙古鞑靼人奴役俄罗斯长达250年，蒙古可汗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是绝对的，具有独裁的性质。因此，是蒙古鞑靼人在罗斯巩固了最高权力的思想。后来，君主独揽大权和专制思想才愈来愈深入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之中。

专制制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源自东正教拜占庭。东正教拜占庭改变了早期基督教的君主概念，认为尘世的君主不再是上帝的仆人，而是神所选定的优秀人物，其权力是上帝的恩赐。在拜占庭，既然皇帝的权力是神授的，那么皇权就大于教权。拜占庭牧首在14世纪末曾经以这种“皇权神授”思想教导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一世（1371—1425）。他说：“如果没有沙皇，基督徒就不可能有教会，因为王国和教会密切联合并且互相交往，是不可能相互分开的。圣沙皇在教会里占有崇高的地位，——他可不像是那些采邑的老爷和大公。”（А.Забияко.1995：212）在俄罗斯，也有人反对专制制度的起源持不同观点。比如，著名的俄罗斯文化史学家康达科夫认为，专制制度是深深而有机地植根于民族——俄罗斯土壤上的一种统一的社会文化形式，专制制度与俄罗斯文化深层结构特征和俄罗斯社会文化的动态特色相适应。（И.Кондаков 1997：169）

专制制度来自拜占庭还是俄罗斯自己的一种社会文化形式，这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专制制度这种社会体制和文化形式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说到俄罗斯的专政制度，首先要提的是伊凡三世（1440—1505）、瓦西里三世（1479—1533）和伊凡雷帝（1530—1584）。因为这三代俄罗斯君主都有着强烈的专制思想，最早意识到中央集权的作用，因此他们为莫斯科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做出了努力和贡献。伊凡三世吞并了雅罗斯拉夫、罗斯托夫、诺夫哥罗德等公国，赶走了鞑靼人，在拜占庭陷落后，他依然与拜占庭公主卓娅¹结婚，并且把拜占庭的双头鹰定为俄罗斯国徽（1497年开始），以此表示俄罗斯继承了第二罗马——拜占庭，他本人则继承了罗马恺撒大帝和拜占庭皇帝的事业；瓦西里三世又把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梁赞归到莫斯科公国，基本上完成了俄罗斯大地的统一，他继承父业，取消了俄罗斯的封邑体制，主张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正是在瓦西里三世执政时期——15世纪末，“俄罗斯”这一名称开始流行，并在东欧出现了一个面积28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900万的俄罗斯国家。

但是在俄罗斯历史上，无论伊凡三世还是瓦西里三世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专制者和专制制度理论的阐释者，因为他俩尚未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没有对专制思想作过系统的阐述。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专制者是伊凡雷帝。伊凡雷帝在1547年登基自称“沙皇”，此后，“沙皇”就成为俄罗斯君主的一个正式称谓，这不但是一个具有神性的尊号，而且意味着沙皇本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伊凡雷帝才是专制制度思想的奠基人和实践者，伊凡雷帝时代才真正开始了俄罗斯社会的专制政体和文化形式。

伊凡雷帝不但是专制制度思想的奠基人和实践者，而且还是专制思想的理论家。他指出专制制度是治理国家惟一可能的和完美的形式，他还第一次阐述了俄罗斯君主专制政权的基本原则，使得专制思想在俄罗斯扎根，并且愈来愈深入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中。

伊凡雷帝在致库尔布斯基的信中对专制思想有过详尽的阐释。他对专制制度的论述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 专制制度是俄罗斯国家的选择。俄罗斯封建割据的历史说明，专制制度是俄罗斯国家的一种必然选择。俄罗斯历史上的封建割据、大公之间“内讧”和“多头领导”局面导致了诸公国的危机和衰败。只有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专制体制和君主个人独裁才能让俄罗斯走上真正的强国之路。

2. 沙皇专制制度具有神性的起源。伊凡雷帝视俄罗斯为神赐的一块宝地：“俄罗斯大地是靠上帝的仁慈、圣母的恩赐、所有圣者的祈祷和我们家长的祝福存在的……”²伊凡雷帝认为从弗拉基米尔大公时代“罗斯受洗”起，俄罗斯人就成为上帝选中的民族，而俄罗斯诸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伊凡三世、瓦西里三世、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俄罗斯君主等都是上帝选中的专制者，执政都是秉承上帝的意旨，他当沙皇不是个人对权力的爱好，而是上帝赋予他的一种职责和使命。因此，皇权是神授的。伊凡雷帝写道：“遵照上帝意旨我生下来就是为了掌握王国权利的。”³他认为自己具有一种超越世俗的权力，承认自己只对上帝负责，为此他还“要赞美上帝无限的仁慈”⁴，“没有一个政权不是来自上帝的：谁若是反对这样的政权，谁就是反抗上帝！”⁵他还引经据典地说：“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名。抗拒的必自取刑罚。”⁶

3. 皇权无限论思想。伊凡雷帝认为专制君主的权力是无限的。沙皇是俄罗斯大地上最高的、惟一的专制者，他的权力不应当受到任何法律和任何人的限制，“俄罗斯当权者无需对任何人汇报，他们有奖赏和处死自己臣民的自由……”⁷

4. 无限的皇权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伊凡雷帝认为皇权无限论对内是坚持真理和遏制邪恶的可靠保障。他在信中问道，沙皇“难道不应当把强盗和小偷处死吗？要知道这些罪犯的狡猾阴谋更可怕！那么所有王国就会由于无序和内讧纷争而解体。”⁸他告诫人们：“要想不怕皇权，那就要做善事；如果要干恶事情——那就要害怕皇权，因为沙皇手中不是白白拿着剑的——是为了恐吓恶棍和鼓励善人。”⁹但他认为沙皇也不是可以滥用权力，因为“除了那些背叛了东正教的人，我们没有从自己的大地上撵走任何人。”¹⁰皇权无限论在俄罗斯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是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大权在握的俄罗斯沙皇不但可以维护社会稳定，避免大贵族的纷争造成的混乱，而且也可以防御外来敌人的进犯，保卫自己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5. 君臣的关系问题。伊凡雷帝认为，君主要亲自管理国家，不能让大臣插手：“自古以来俄罗斯的所有王国都是专制君主亲自治理，而不是大贵族和达官贵人。”¹¹“如果自己 not 掌权，那还叫什么专制君主？”伊凡雷帝在这里强调了专制君主不能大权旁落，不容许大贵族和达官贵人插手他的国务活动和对问题的决策。总之，伊凡雷帝在致库尔布斯基的信中对专制思想和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详尽的叙述，是16世纪的一部重要的哲学的和文化的文献。

伊凡雷帝的专制思想是有其宗教—哲学的背景和前提的。首先，他的这种思想来自“莫斯科——第三罗马”理论。早在1524年，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菲洛费伊在致瓦西里三世（伊凡雷帝的父亲）的信中，提出了“莫斯科——第三罗马”思想。这一思想的内涵是：第一罗马和第二罗马——拜占庭的灭亡是由于他们背叛了“真正的基督教”，被异教和拉丁教徒搞垮

了。莫斯科是基督教真正的捍卫者，是第三罗马，莫斯科也是最后一个罗马，第四罗马是不会有的，因此它将永远存在下去。更为重要的是，菲洛费伊认为俄罗斯沙皇是普天之下所有基督徒唯一的沙皇，因此“莫斯科——第三罗马”的理论巩固了俄罗斯君主制意识，为伊凡雷帝的专制思想提供了宗教依据。

其次，15世纪末东正教教会内部出现的约瑟夫派理论成为伊凡雷帝专制思想的宗教哲学基础。约瑟夫派思想家约瑟夫·沃洛茨基（1439/44—1515）的《启蒙者》是该派思想理论的一部纲领性著作，他阐述了沙皇权力的来源问题。他写道：“沙皇就自己的本性来说与任何人别无二致，可就其职务和权力来说，他就像至高无上的上帝。”（А.Забияко.1995: 213）约瑟夫·沃洛茨基称沙皇为“神和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儿子”。与此同时，他强调沙皇专制政权和强大的教会是改变世界的必要条件，因此主张沙皇专制政权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联合。约瑟夫派希望东正教俄罗斯成为“基督的东方”，承担拯救人类的伟大使命，要把基督精神推向整个俄罗斯，并且要推广到全世界。约瑟夫派理论的最终目的是把世俗的沙皇政权宗教化。

可见，菲洛费伊的“莫斯科——第三罗马”思想和教会约瑟夫派的思想是伊凡雷帝专制思想的宗教—哲学基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伊凡雷帝与东正教教会的密切联系。但是，应当指出，伊凡雷帝与教会之间有联合也有矛盾，他的残忍暴政和恐怖活动引起教会人士的不满和抗议，同时伊凡雷帝也不敢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对抗，因为他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需要东正教教会的支持，“东正教促进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建立……这是在中世纪和独立国家里东正教占统治地位条件下的一种自然的社会‘结果’。”（Д.福尔曼 1988: 96）而专制制度是东正教的必要堡垒。东正教把专制政权圣化，不但颂扬上帝，而且颂扬上帝赐给的世俗政权——皇权，沙皇就被视为“人间的上帝”。因此，伊凡雷帝又不得不向教会让步，这样一来，沙皇专制制度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在利益互惠的基础上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世俗政权与教会之间相互依赖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伊凡雷帝时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

当时伊凡雷帝并不是专制思想惟一的倡导者，许多同时代人，像“重臣拉达”中的几位成员——都主教马卡里、神甫西尔韦斯特以及许多禁欲派分子都赞成专制制度。但是，伊凡雷帝的专制思想与“重臣拉达”和禁欲派的专制思想有所不同。

“重臣拉达”（Избранная рада）有人译成“忠臣会议”，是当时的一个类似后来杜马的贵族咨议机构。成员有都主教马卡里、А.库尔布斯基、М.莫罗佐夫、И.舍列缅捷夫、库尔里亚捷夫等人，由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报喜节大教堂神甫西尔韦斯特和 А.阿达舍夫领导。神甫西尔韦斯特是“重臣拉达”的灵魂，他对伊凡雷帝的宗教世界观体系形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重臣拉达”这个词是由 А.库尔布斯基在自己的著作《莫斯科大公史》中第一次提出来的¹²。“重臣拉达”成员虽然主张君主权力，赞成专制制度，但认为俄罗斯沙皇治理国家还需要依靠“贤士”的帮助，因为好的贤士会帮助沙皇，就像坚固的钟楼能守卫城堡一样。此外，西尔韦斯特还提出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要依靠地方自治。可见“重臣拉达”希望把强大的中央集权与广泛的地方自治管理结合起来。起初，伊凡雷帝听从了西尔韦斯特的这个建议，在俄罗斯各地展开地方自治会议。但后来的地方组织会议就形同虚设了。“重臣拉达”的另一位成员库尔布斯基主张等级君主制，认为君主的权力应与衙门机构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等级代表机关相结合，而伊凡雷帝主张专制制度和专制君主的无限权力，这就是库尔布斯基等级君主制思想与伊凡雷帝的专制思想的分歧，也是造成库尔布斯基与伊凡雷帝争论的原因。

禁欲派思想家瓦西安·科索伊（？—1545）曾经提出要明确区分皇权和教权活动的界限，只有这样人才能够达到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个性的变容。接近禁欲派的著名政论家、作家、翻译家、语文学家马克西姆·格雷克（约 1475—1556）认为君王的精神品质应当与自己的职位相称，认为沙皇应当像圣子基督那样爱人类、主持正义、温良谦让，同时皇权必须受到限

制，沙皇应当与贤明的谋士一起执政并且要遵循基督教道德的准则。

改革家伊凡·佩列斯维托夫也主张专制制度，但他认为专制者要基于公正和一定的法律治理国家；他还认为沙皇要听从下属的建议，因为他们是专制制度的支柱。

从“重臣拉达”、禁欲派和佩列斯维托夫等人对专制制度的认识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专制者要听从下属的意见，认为皇权不是无限的。可是伊凡雷帝主张绝对的专制制度和无限的皇权，沙皇有权决定一切，专制者不遵循任何法律，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受任何法律和任何决议的限制。伊凡雷帝认为自己是全俄罗斯的独裁专制君主，所有的下属在他面前都是一样的“奴隶”，他视自己为整个世界的中心，他为所欲为，怀疑一切，唯我独尊，一意孤行。皇权无限思想导致伊凡雷帝本人的兽性本能膨胀，把他引向了极端、绝对甚至荒唐的地步，让自己与整个皇室、整个宫廷、整个国家处于一种敌对的状态，出现了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专横、可怕乃至恐怖的时代。

比如，“重臣拉达”曾经帮助伊凡雷帝治理国家，起到了“智囊团”的作用。“重臣拉达”的一个明显的功绩是帮助伊凡雷帝取得了1552年喀山战役的胜利。但是喀山战役后，伊凡雷帝认为自己是上帝选中的惟一沙皇，因此不需要任何贤士的建议和帮助。伊凡雷帝的专制思想造成他与“重臣拉达”的政治决裂。在喀山战役胜利后的第三天，他就公开对“重臣拉达”的人士宣称：“如今上帝让你们离开我！”他的这种态度让“重臣拉达”的主要成员对他敬而远之。16世纪60年代初，伊凡雷帝解散了“重臣拉达”，西尔韦斯特和A·阿达舍夫失宠后被调离莫斯科，而像库尔布斯基则逃往国外，以免遭到杀头的厄运。

二

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君主从伊凡三世到伊凡雷帝都深深认识到，蒙古鞑靼人在俄罗斯250年的统治把俄罗斯与西方世界隔绝开来，拉大了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和欧洲文明的距离。俄罗斯要想走出落后和愚昧，加强与西欧国家上文化联系和交流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因此，一方面，伊凡三世在位时就从意大利等国请来一些建筑师、雕塑家、画家来俄罗斯，他们给俄罗斯带来了西方文化的经验和传统。伊凡雷帝执政时期，莫斯科中央集权国家积极引进西方文化，以缩小俄罗斯与西欧国家的文化差距；另一方面，俄罗斯依然注意接收拜占庭的东方文化传统，甚至吸收鞑靼游牧民族文化的成分，那时的俄罗斯文化具有东方文化的一些特征。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莫斯科公国时期的俄罗斯文化是一种东方文化，一种基督教化的鞑靼王国文化。宗教哲学家H.特鲁别茨可伊也指出莫斯科中央集权时代的俄罗斯文化大量吸收了鞑靼文化的成分。他在自己的《俄罗斯文化里的图兰成分》一书里写道：“莫斯科国家是由于鞑靼统治产生的。……俄罗斯沙皇是蒙古可汗的继承人。‘推翻了鞑靼人统治’导致东正教沙皇替代鞑靼可汗并且把鞑靼可汗大本营移到莫斯科。”（H.C.Трубецкой1993：72）他认为莫斯科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既受成吉思汗的影响，也受东正教和拜占庭传统的影响，因为拜占庭消亡和都城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东方（希腊）正教思想和文化的继承者。当代的俄罗斯文化史学家康达科夫发挥了特鲁别茨可伊的观点，认为“莫斯科文化是在积极掌握、适应游牧东方（在否认其东方起源情况下）的各种成分和形式条件下形成的。”（И.Кондаков1997：195）康达科夫还特别指出莫斯科沙皇们登基时戴的皇冠“‘莫诺马赫的帽子’并不是源自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莫诺马赫，而是来自鞑靼穆尔扎¹³的头饰，即东方游牧民族文化的东西，它成为了俄罗斯国家体制的象征、俄罗斯专制制度的标志，把东方专制和拜占庭恺撒主义撮合在一起。”（И.Кондаков1997：195）可见，俄罗斯既接受西方文化，又吸收东方文化，使自己具有东西方文化成分的特征，而这种特征是从沙皇伊凡雷帝专制制度时代开始凸现出来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在接受西方文化问题上与伊凡三世、伊凡雷帝等俄罗斯沙皇有分歧。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坚决主张维护俄罗斯文化的东正教传统，敌视西

方文化，拒绝接受拉丁化的西方文化。“莫斯科——第三罗马”理论把俄罗斯与“拉丁的”西方世界对立起来，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反对俄罗斯与西方天主教国家的文化交流，坚持俄罗斯文化的封闭性。这说明在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与伊凡雷帝的沙皇专制制度有不同甚至矛盾的一面。

伊凡雷帝时代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促进了俄罗斯各地文化的融合，形成了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全俄罗斯民族文化。俄罗斯文化不再停留在拜占庭式的宗教文学、圣像画、教堂建筑、教堂音乐以及宗教训诫的层面，而上升到哲理的概念层次，表现出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觉醒倾向。

伊凡雷帝时代，在俄罗斯文化发展中有两种倾向：一个是文化的世俗化萌芽；另一个是文化上表现出专制思想的影响。

首先，是俄罗斯文化发展中的世俗成分萌芽。从16世纪开始，尽管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势力十分强大，宗教世界观依然决定着俄罗斯社会和人们的精神生活，但含有世俗文化成分的西方文化进入俄罗斯文化生活中，对俄罗斯社会的精神生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俄罗斯文化中的人文思想和世俗成分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像马克西姆·格雷克、伊凡·佩列斯维托夫、费多尔·卡尔波夫等人的政论文明显有悖于俄罗斯东正教的正统思想，但却有一定的市场并引起愈来愈多读者的兴趣。俄罗斯文学也力图摆脱基督教文学，寻找强调人的自我表现和表达情感的新体裁和新形式。比如，这个时期出现了“讲话”、书信、小品文等文学体裁，作家运用了辩论、讽刺等新的艺术手段。在文学作品里，一些主人公的思想和行为虽然受着宗教思维的约束，但已经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理性思维开始指导人向善的行为。在绘画艺术上，圣像画家也不是完全按照俄罗斯传统的圣像画模式，而是运用西方绘画的一些结构和手法，凭自己的想象去创作。这一切表明，俄罗斯文化越出古老的宗教文化的思想和模式，试图开始文化的世俗探索。俄罗斯文化的世俗探索引起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不满和不安。针对俄罗斯文化的世俗成分萌芽和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存在的问题，在都主教马卡里的倡议和沙皇的积极参与下，1551年在莫斯科举行了宗教百条会议，制定并通过了《百条宗教决议》。宗教百条会议是俄罗斯国家宗教生活的一件大事，《百条宗教决议》（1551）虽然主要是针对俄罗斯宗教僧侣内部生活以及宗教僧侣同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法规，诸如要限制教会获得土地和出卖土地的权利，禁止修道院放高利贷，反对修士酗酒和淫乱，甚至规定出祈祷时划十字的方法、教堂里行走的方向、呼“阿里路亚”的次数等内容，但《百条宗教决议》也是一部反映伊凡雷帝时代文化精神的法律。因为这部法律的一些条款对家人的日常生活、家庭教育、衣着言行、游戏娱乐、甚至做饭等方面的行为都做出具体的规定，为的是让人们不要偏离俄罗斯古老的宗教习俗。《百条宗教决议》还对绘画、建筑、文学乃至精神文化的各个种类都规定出严格的范式。比如，安德烈·鲁勃廖夫的圣像画是圣像绘画的范例；克里姆林宫五圆顶安息大教堂是祭祀建筑的范例；都主教马卡里的著作是文学的范例等等。《百条宗教决议》还规定，教堂绘画有两种规范，一种是“风习画法”（传统的福音书内容和圣经内容），另一种是“寓言画法”（以寓言、圣者行传为题材），此外，对圣像画上的人物位置、色彩的使用都有严格的规定，教会还责成专门的长老监视圣像画画家的创作。《百条宗教决议》把文化艺术创作“规范化”，这明显表现出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与文化世俗化斗争的决心。俄罗斯东正教要铲除俄罗斯文化的世俗成分和现象，把俄罗斯文化纳入东正教意识形态的轨道，以维护俄罗斯文化发展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从伊凡雷帝时代开始，俄罗斯文化日渐离开古老的宗教习俗和传统，不断接受和吸收西方世俗文化的成分，开启了文化的世俗倾向。因此《百条宗教决议》无法扭转俄罗斯文化的这种学习西方文化、接受世俗文化影响的进程。

其次，伊凡雷帝时期俄罗斯文化发展中的另一个倾向，是文化的各个门类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专制思想的痕迹，并且为俄罗斯专制制度国家服务。专制制度是一种让人产生奴性

的制度，俄罗斯侨民哲学家Г·费多托夫说，在几百年的俄罗斯专制制度的历史时期里，“奴性状态对莫斯科人来说是一种历史习惯的、几乎是自然的状态。”（Г.П. Федотов 1992: 192-193）沙皇专制制度政权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联合在一起，让俄罗斯人言听计从、奴性十足，不容许各种自由思想、偏离东正教社会文化准则和主张社会平等的“新学说”（费奥多西·柯索伊的“基督教平等”、马特维·巴什金的“反对偶像崇拜”学说）存在，并且与之进行残酷的斗争。专制制度把文化变成一种工具，文化的建筑、绘画、音乐和文学等门类反映和表现专制思想，宣扬专制思想，驯服地为专制制度服务。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建筑群是15—16世纪俄罗斯的一个独具一格的文化艺术现象。克里姆林宫的建成不但体现出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力量，而且克里姆林宫这个沙皇官邸既是专制制度和民族自我意识增长的标志，又是俄罗斯摆脱东正教拜占庭控制、引进西方建筑艺术的例证。众所周知，克里姆林宫以及周围的防御工事的始建，是出于莫斯科中央集权国家和与中央集权对抗的大贵族分离主义斗争的需要。1485年，伊凡三世登基后就把改建克里姆林宫当成莫斯科国家的头等大事。1485年开始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改建工程。这个工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红墙和塔楼的修建，另一部分是中央广场的修建工程。1484年，在大教堂广场上开始同时建造两座教堂——报喜节教堂和祝圣大教堂。后来又建造了天使长大教堂、安息大教堂和伊凡雷帝钟楼。克里姆林宫内几座教堂的兴建是俄罗斯建筑的新思想和新风格的见证。莫斯科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打破了地方建筑学派的封闭性，促进了各地建筑派别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丰富，形成了朴实的结构与强调外部装饰相结合的俄罗斯建筑风格。意大利建筑师阿列维兹·诺威、亚里斯多德·费奥拉瓦第、邦·福里亚金等人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一些思想和风格运用到安息大教堂、天使长大教堂、伊凡雷帝钟楼等宗教祭祀建筑物中，使之成为俄罗斯建筑与西欧意大利建筑风格的合璧。到了伊凡雷帝时期，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国家和进一步与大贵族分离主义进行斗争，伊凡雷帝动用大量资金，调动大批劳动力加强莫斯科、尤其是克里姆林宫的防御工事，修建了“中国城”城墙。可见，克里姆林宫防御工事建筑与巩固和加强莫斯科专制制度国家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法国记者阿斯托尔弗·德·屈斯蒂纳在谈到克里姆林宫时，说它是“沙皇风格建筑”，“伊凡雷帝——是理想的暴君，克里姆林宫——是暴君理想的宫殿。沙皇——这是生活在克里姆林宫里的那个人。克里姆林宫——这是沙皇生活的家。”（Де Кюстин 1990: 188）

红场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是伊凡雷帝时代建筑艺术的一个杰作，标志着16世纪俄罗斯建筑的最高成就。这座教堂是为了纪念伊凡雷帝夺取喀山胜利而建的，显示出伊凡雷帝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强大和强调专制制度国家的力度。瓦西里升天大教堂有一个像柯洛缅斯科耶的升天大教堂一样的锥形尖顶，除了具有升入天国的涵义外，还表现16世纪俄罗斯国家力求向上的精神氛围和发展思想，但这个锥形尖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坐落在不同层次的8个圆弧顶环绕着，是对中古世纪俄罗斯圆弧顶教堂建筑传统模式的突破，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一些成分与俄罗斯木建筑方法融合在一起。

伊凡雷帝时代，圣像画和壁画依然是俄罗斯绘画的主要体裁，但这两种体裁的绘画获得了更加浓厚的象征—寓意性质。画家的画作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圣经题材，如克里姆林宫的安息大教堂里的巨幅圣像画《启示录》，开始描绘世界历史和俄罗斯历史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象征寓意地歌颂沙皇专制制度和俄罗斯东正教，像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报喜节大教堂里的许多描绘莫斯科诸大公与弗拉基米尔和基辅大公的历史继承关系的壁画。这个时期的圣像画在形象的神性、轮廓的处理、色彩的运用上都比从前有了一定的进步。

16世纪中叶，有一幅名为《黠武的教会》的大型壁画（144×396cm），最能表现这个时期的画家用绘画作品表现专制思想的特征。这幅画绘在克里姆林宫安息大教堂沙皇御座旁边的墙上，可见沙皇本人和整个俄罗斯教会赋予这幅壁画的重要意义。

这幅壁画是为了纪念伊凡雷帝战胜喀山的鞑靼可汗而作的。画面上，浩浩荡荡的马队和

步行军队在胜利地凯旋。天使长米迦勒骑着一匹带翼战马走在凯旋队伍的最前面。这支军队从烈火熊熊的喀山走向天国的城市——“新耶路撒冷”，圣母怀抱圣婴在那里被一群飞翔的天使簇拥着，坐在神位上迎接前来的队伍。行进在凯旋队伍中间的既有东正教世界历史上的英雄们，也有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大公们，如弗拉基米尔大公、他的儿子鲍利斯和格列勃、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以及俄罗斯历史上其他有名的军事将领。在整个凯旋队伍中有两个尤为突出的人物：一个是拿着十字架的拜占庭君主君士坦丁；另一个是战胜蒙古鞑靼人的俄罗斯沙皇伊凡雷帝……这幅画的寓意十分明确：歌颂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沙皇和俄罗斯专制制度。画家用这幅画表明莫斯科公国是上帝选中的并且受到天使和圣母庇护的地方，伊凡雷帝和俄罗斯军队攻克喀山是东正教在圣罗斯大地上的胜利，是上帝和圣母保护、帮助的结果。《黩武的教会》这幅画出现在16世纪中叶不是偶然的，它是俄罗斯国家变成圣罗斯的一个最明显的象征。圣罗斯不仅仅让人联想到“第三罗马”，而且也联想到“新耶路撒冷”，同时形象地表现出莫斯科中央集权国家的专制思想和“莫斯科——第三罗马”理论。

16世纪以前的俄罗斯合唱音乐主要用于教堂祭祀仪式，16世纪随着俄罗斯国家专制制度的加强，合唱音乐愈来愈多地运用于世俗生活，出现在与俄罗斯专制君主——沙皇有关的活动中。诸如沙皇登基、皇室的婚礼、接见外国使节、庆祝抗敌胜利的国务活动等等。因此，合唱音乐成为沙皇专制者和俄罗斯专制国家服务的一个艺术形式和工具。此外，由于伊凡雷帝接受西方文化的思想，小提琴和小钢琴等西欧乐器传入俄罗斯，丰富了俄罗斯音乐的演奏手段和俄罗斯上层社会的音乐生活。

伊凡雷帝时期，编年史、历史题材作品和政论题材作品构成了这个时期俄罗斯文学的辉煌。这些题材的文学作品不但充满教谕和道德说教的内容，表现出伊凡雷帝专制时代的风格，而且渗透着巩固专制制度、加强专制政权与东正教教会联合的思想，显示出这个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

在伊凡雷帝时代，编年史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和文学现象。编年史大多由沙皇及其政权组织人编纂，因为编年史的内容要表现沙皇的强权意识，要为专制制度服务。比如，《尼康编年史》（约1539—1542）的主导思想，就是要展现莫斯科公国的历史，向读者灌输伊凡雷帝是罗马和拜占庭皇帝的继承人的观念，宣传费罗菲伊的“莫斯科——第三罗马”思想。另一本编年史《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大公王国之初的编年史家》（50年代）记述了1534—1553年的历史事件，这部编年史的作者之所以挑选这段历史时期，是因为他觉得这20年历史能够充分证明俄罗斯国家的强大和沙皇专制政权的必要性。再如《关于弗拉基米尔诸大公的传说》一书，是俄罗斯专制制度理论的表述。这本书宣扬一种观点，即莫斯科诸大公是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和莫诺马赫的继承者，有被封为沙皇尊号的合法权利，有权进行专制统治。从以上几部编年史的思想内容来看，这个时期的编年史主要是宣传专制思想和服务于沙皇专制制度。

伊凡雷帝时代，历史题材作品也同样成为官方专制思想的传声筒。比如，《皇室宗谱》（«Книга Степенная царского родословия»）（1563）是由神甫安德烈（后来是都主教阿法纳西）编纂的一部俄罗斯历史文献。全书共17章，系统介绍从弗拉基米尔大公到伊凡四世的俄罗斯历史。编纂者安德烈以一种崇高文体叙述了从弗拉基米尔大公到伊凡雷帝的俄罗斯历史，是一部最能代表官方专制思想的历史著作。编纂者安德烈并不是对几百年的历史事件进行确切的叙述，而主要在颂扬历代的俄罗斯大公，宣传莫斯科诸大公政权与基辅诸大公政权的继承关系以及沙皇专制权力的神性起源。编纂者在叙述历史事件中夹杂着对一些都主教活动的记述，以说明大公政权与教会之间永恒的牢不可破的联盟。诚如Д.利哈乔夫所说，这本书“作者的使命只在于提供历史，就像举行一次国家的检阅，让读者产生一种虔诚的恐惧和对国家牢固和君主贤明的信念。”（А.Забияко.1995：219）

为了更好地确立俄罗斯专制制度意识形态，为俄罗斯教会约瑟夫派提供一部“大有教益的读物”。莫斯科和全俄都主教马卡在沙皇支持下从1542年起经过长达25年收集而成的一部文集——《经文汇集》（«великие четьи—миней»）。《经文汇集》这部大全是手抄的，全书12卷，共有13000多页。《经文汇集》的内容含有《圣经》章节、圣徒传、教父著作、教会作家著作、法典、法令、文书等等。如，希腊神甫们和俄罗斯教会作家的著作、都主教的寄语、教会的章程、公文。进入大全的还有在罗斯流行的《蜜蜂》、《金链》文集、尤素福·弗拉维的《耶路撒冷的陷落故事》、科斯马·英基可普罗夫的《宇宙志》、修道院长丹尼尔¹⁴的《旅行记》等等。《经文汇集》是一项集体劳动的成果，许多作家、翻译家和抄写者如叶尔莫莱—叶拉兹姆（？—16世纪中期）、瓦西里·图奇科夫、德米特里·格拉西莫夫、伊里亚·普列斯维杰尔（长老）、塞尔维亚修士作家列夫·菲洛洛克等都参加了《经文汇集》的编纂工作。《经文汇集》几乎成为16世纪中叶以前俄罗斯文学作品的“百科全书”，是一部极为宝贵的俄罗斯文化文献。

在谈到这个时期的文学时，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家训》（亦译《治家格言》）这本书。因为它是那个时代道德伦理的箴言集。这部作品的出现是16世纪俄罗斯专制制度国家希望整顿社会道德，划一人们的生活准则，并且用文献形式把家庭准则和道德规范具体化和系统化的结果。因为在16世纪的俄罗斯，尽管宗法制家庭的生活准则和宗教道德思想有着强大的势力，但无论在家庭生活里还是社会生活中都出现了一些无视宗法制家规和东正教道德规范的现象。如乱伦、殴打妻子、出卖子女、酗酒，教堂里乌烟瘴气，大声说话、吵闹、甚至说脏话，出现不虔诚祈祷，甚至渎神现象。针对这些现象的孳生，神甫西尔韦斯特（？—1566）编纂了《家训》这部作品。《家训》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主要是提出一系列个人家庭生活的实际建议和忠告。流行较广的《家训》第二个版本，是莫斯科报喜节大教堂神甫西尔韦斯特编纂的。这个版本共有64章。第1—15章是宗教生活准则，第16—29章是家庭生活规定，第30—63章是从事经营活动应遵循的规矩。神甫西尔韦斯特编纂的《家训》概括了东正教道德经验并提出旨在执行的道德准则体系，这部《家训》把家庭生活的世俗规范和准则变成了一部迎合专制制度国家和教会生活方式的法典。同时，由于《家训》还十分详细地阐述了诸如人的尘世存在、人的灵魂救赎、人与亲人的关系等一系列人生哲学问题，因此它也是16世纪俄罗斯的一部文化大全。

伊凡雷帝时期，政论体裁作品构成了当时文学发展的另一个辉煌，出现了一批极为出色的政论家，像约瑟夫·沃洛茨基、丹尼尔·瓦西安·帕特里凯耶夫、马克西姆·格雷克、安德烈·库尔布斯基、甚至沙皇伊凡雷帝本人都是出色的政论家。

伊凡雷帝与库尔布斯基的通信争论是16世纪君臣之间的一场著名的论争，是政论题材文学的佳篇。

伊凡雷帝聪明睿智，善于辞令，思维敏捷，他通晓古罗马历史，熟知古罗斯文学，能成段地背诵圣经和俄罗斯编年史，此外他还会作曲，并且有出色的歌喉。总之，伊凡雷帝是个有着相当文化品位的沙皇，一位出色的政论作家。伊凡雷帝致库尔布斯基的两封信、他给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一世的信、给瑞典国王尤翰（Юхан）三世的信（1572年、1573年）、给波兰国王斯提芬·巴托利的信（1579年、1581年）、致基里尔—别洛泽尔斯基修道院的信、致瓦西里·格利亚兹诺伊的信都是那个时代出色的政论文作品，充分显示出伊凡雷帝的雄辩能力、清晰的思维和博览群书的才华。

库尔布斯基（1528—1583）是雅罗斯拉夫大公的后代，大贵族和国务活动家。他曾经是伊凡雷帝的一位重要的军事将领，参加过夺取喀山的战役，并且多年与立窝尼亚作战，战功显赫。库尔布斯基还是“重臣拉达”成员，一生著述颇丰，写过《莫斯科大公传》一书。这是16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政论题材文学的一部重要文献。库尔布斯基记述伊凡雷帝执政的历

史，主要是解释他变成一位凶残暴君的原因。作品由两部分组成。作者在第一部分阐述具体的事实，力求揭示伊凡雷帝怎样由一名显贵的君主变成不公正的沙皇。在第二部分中作者谴责沙皇伊凡雷帝的一系列暴行政策，是对伊凡雷帝国策做出的反应，库尔布斯基认为伊凡雷帝是“撒旦的儿子”、启示录里的“野兽”。《莫斯科大公传》不但表明库尔布斯基十分熟悉《圣经》，而且也非常了解许多俄罗斯编年史。总之，库尔布斯基的《莫斯科大公传》以及致伊凡雷帝的3封信表明他是一位出色的政论家，属于16世纪优秀的政论体文学作品，成为俄罗斯文化的重要遗产。1564年4月，他从刚刚属于俄罗斯国家的立陶宛尤里城逃往属于波兰国王西吉斯孟德二世奥古斯丁的立陶宛城市沃尔马尔。库尔布斯基逃亡是因为他预感到自己要遭到沙皇伊凡雷帝的迫害，但从此他成为背叛俄罗斯和伊凡雷帝的罪人。

众所周知，伊凡雷帝和库尔布斯基是当时俄罗斯社会政治舞台上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伊凡雷帝是专制制度思想的奠基人，而库尔布斯基是社会中以大贵族为首的反对派阶层的代言人。伊凡雷帝认为在俄罗斯只能有他伊凡雷帝一种声音，不容许其他人发表与他不同的言论，简言之，伊凡雷帝就是主张具有独白性质的“一言堂”。利哈乔夫指出，“伊凡雷帝把解决自己时代所有的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的责任承担在自己身上。……伊凡雷帝认为，作为‘上帝的受过登基涂油仪式的君主’，惟有他一个人可以对人们和历史做出评判。在他的王国里任何人都不敢说出与伊凡雷帝断言相左的观点。文化及其所有的表现获得一种独白的性质。”¹⁵因此，库尔布斯基在俄罗斯没有机会而且也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有离开俄罗斯之后，库尔布斯基才敢写信给伊凡雷帝，与他进行辩论。

1564年5月，库尔布斯基从立陶宛写第一封信给伊凡雷帝，1564年7月5日，伊凡雷帝给库尔布斯基回信。之后，库尔布斯基给伊凡雷帝回了自己的第二封信（无具体日期），1577年，伊凡雷帝给库尔布斯基回了第二封信，即他的第一封回信之后过了13年。随后，库尔布斯基给伊凡雷帝写了第三封信，并结束了他们两个人的通信争论。

库尔布斯基在自己的三封信中，指出伊凡雷帝是制造一切罪孽的罪魁祸首，他指责伊凡雷帝迫害、折磨和处死一些大贵族和军事长官的“罪行”，谴责他对臣民的残酷行径。此外，库尔布斯基为所有失宠的大贵族辩护，进而也为自己的叛逃辩护。伊凡雷帝的两封回信详尽地阐述了自己作为沙皇的宗教神秘主义使命，认为自己是上帝选中的惟一臣民，同时揭露了库尔布斯基背叛俄罗斯的叛国行为。伊凡雷帝与库尔布斯基的通信争论问题的主要焦点是：1、谁是真正的基督徒？谁真正忠于东正教？伊凡雷帝和库尔布斯基都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基督徒，两个人都援引《圣经》文本给自己寻找理论根据和支持；2、专制制度和“皇权神授”问题。俄罗斯应当由上帝选中的专制君主统治，还是让大贵族参政？伊凡雷帝认为大贵族是专制制度重要而危险的敌人；3、关于君臣的相互关系问题。俄罗斯君主应当如何对待自己的下属和臣民。

从5封信的内容和争论的问题来看，伊凡雷帝系统、全面地阐述专制思想，而库尔布斯基则表达出自己对伊凡雷帝的专制和暴政的否定态度。伊凡雷帝和库尔布斯基写信显然远不是针对收信人的，而是针对社会界的广大人士和众多的读者。因此，他们两个人的论争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是16世纪俄罗斯文化史上一个有重要意义的事件。

伊凡雷帝时代，文化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上述诸方面，教育、印刷术、铸造业等物质文化的许多方面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1551年的宗教百条会议的决议，规定在莫斯科和全国所有城市办学校。此后，出现了一批私立学校、修道院和教区教堂办的学校，甚至在一些乡村里也办起了学校，使得许多孩子能够在学校学识字和书本文化。在伊凡雷帝的倡议和教会的支持下，在俄罗斯出现了活字印刷术。1553年伊凡·费多罗夫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座印刷所，印出了俄罗斯第一批印刷书籍《使徒福音》、《日课经》、斯拉夫—俄文字母课本等书籍。活字印刷术标志着书籍出版

业的一个飞跃，俄罗斯书本文化史的一个里程碑，是俄罗斯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印刷书籍不但促进了文化知识的传播，而且有助于巩固专制制度和加强教会的作用。此外，铸造业也有了飞跃性的进步。俄罗斯工匠 A.乔霍夫铸造的重 40 吨，炮身长 5.34 米，炮筒直径 89 厘米的炮王（1586，现存克里姆林宫），就是当时俄罗斯铸造业发展和枪炮武器水平的佐证。

伊凡雷帝时代，俄罗斯文化是在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专制制度的条件下发展的。专制制度作为俄罗斯的一种国家体制，与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联合在一起，让俄罗斯文化带有奴性的性质，束缚和制约文化发展的进程；但是，伊凡雷帝时代，沙皇伊凡雷帝的专制和学习西方文化的思想促进了俄罗斯文化的进程。伊凡雷帝专制制度的压迫也激发了文化创造者对自由的向往，增强了人对智力解放的渴望，刺激了俄罗斯文化的发展，加快了俄罗斯文化的世俗化进程，为 17 世纪俄罗斯文化走出中古世纪做好了准备。俄罗斯文化史学家康达科夫在论述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专制制度与俄罗斯文化关系时曾经指出，“如果没有巩固了专制制度的尼古拉一世（不像把专制制度搞得摇摇欲坠的自己的哥哥亚历山大一世），在俄罗斯大概就不会有晚年的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大概就不会有别林斯基和赫尔岑、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谢德林、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列·托尔斯泰。斯拉夫派分子和西欧派分子、自由派分子和激进民主派分子的争论是在尼古拉一世的刺激下出现的。政治移民现象和自由出版、免于审查的呼吁以及文学中伊索式的寓意在尼古拉一世时期获得了充分发展。尼古拉一世离开政治舞台之后，改革成为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在俄罗斯文化和社会历史中，两个极端的辩证关系就是如此。”（И.Кондаков.1997：207）我们认为康达科夫的这种认识同样适用于对伊凡雷帝专制制度和那个时期俄罗斯文化发展的研究和考察。

附注

1 卓娅·巴列奥略是巴列奥略王朝（1261 - 1453）最后一位皇帝康斯坦丁十一世的侄女。拜占庭陷落后，她与父亲一起逃到罗马，她父亲死在那里。1473 年卓娅嫁给伊凡三世。卓娅与许多希腊侨民一起到莫斯科，并带去许多希腊文书籍。

2 《古罗斯文学文献》（16 世纪后半叶），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85 年，第 41 页。

3 同上，第 81 页。

4 同上，第 23 页。

5 同上，第 27 页。

6 同上，第 35 页。

7 同上，第 59 页。

8 同上，第 33 页。

9 同上，第 35 页。

10 同上，第 71 页。

11 同上，第 31 页。

12 同上，第 229 页。

13 15 世纪鞑靼封建国家的贵族称号。

14 丹尼尔（1492 - 1457），都主教、政论家，是约瑟夫·沃洛茨基死后的约瑟夫派首领。

15 《古罗斯文学文献》（16 世纪下半叶），莫斯科，文学艺术出版社，1986 年，第 6 页。

参考文献

[1]Бычков В.2000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в двух частях)[М]. Урао.

- [2] Георгиева Т. 1999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М]. М.
- [3] Гумилев Л. 2004 От Руси до России[М]. М.
- [4] Забияко А. 1995 История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М]. М.
- [5] Кондаков И. 1997 Введение в историю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М]. М.
- [6] Де Кюстин. маркиз. 1990 Николаевская Россия[М]. М.
- [7] Драча В. 1999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 в вопросах и ответах[М]. М.
- [8] Перевезенцев С. 2004.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М]. М.
- [9] Пятецкий Л. 1998 По тропам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М]. М.
- [10] Трубецкой Н.С. 1993 О туранском элементе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J]/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Европой и Азией: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блазн[С]. М.
- [11] Федотов Г.П. 1992 Судьба и грехи России В 2 т.[М]. СПб.
- [12] Памятник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16-ого века[Z]. М. 1986.
- [13] Д. 福尔曼 1988 弗拉基米尔大公的选择[J], 哲学问题, 第 6 期。

The Autocracy Theory of Tsar Ivan the Terrible and It's Some Expressions in Russian Culture

REN Guang-xuan

(Peking university, Pek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Russia The Tsarist autocracy has established in the reign of the Tsar Ivan the Terrible. The Tsarist autocracy is both a social systems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As the founder and the main theorist of the Tsarist autocracy, Ivan the Terrible for the first time practised it in Russi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igious-phil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Tsar Ivan's autocracy theory, explains it's main contents and some expressions in the Russian culture.

Key word: Tsar Ivan the Terrible; Tsarist autocracy; Russia

收稿日期: 2007-03-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俄罗斯文学与圣经》(项目编号: 05JJD740007),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承担。

作者简介: 任光宣(1944-), 河北怀来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俄罗斯文化。

[责任编辑: 刘 锐]